



河流之上

夏梓言

两条河流，一西一东，由北向南从城市穿流而过。河流是罗纳河与索恩河，城市呢是里昂。

秋空爽朗的午后，我独自一人一直沿着河流走，发现两条河在城市的西南角交汇，中间形成的半岛地带是里昂的市中心。书上说，半岛的北侧是红十字山，旧时的丝织工业发迹于此。

山上的斜坡区与里昂老城一起因其中的中世纪串廊而被收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老城位于索恩河西岸，背依富维耶山。马可说，里昂就是从这里开始一步步东扩，后来成为现代化城市。新兴的罗纳河以东的地区集中了大部分人口；“铅笔楼”高耸入云，成为古老里昂的新地标。

马可呢是我在法国认识的一位画家。像马可这样来法国“追求艺术”的中国人还有很多，甚至对于全世界的艺术爱好者来说，法国都是一个令人魂牵梦萦的地方，即便不了解艺术的人也会这么想。

和许多人一样，我对里昂的印象始于历史教材上被誉为无产阶级革命初始标志事件之一的里昂纺织工人大罢工。这大概比我们生出法国艺术幻想的那一刻还要早。里昂仍然是法国乃至欧洲的丝绸制造业中心，罢工也屡见不鲜。不过，罢工绝非我们想象中那般轰轰烈烈，如游行示威，而更像是一种有计划、有条理的休假。

刚来到法国的中国人都会对周日心怀诧异。商铺不开、人潮不在，上帝给自己放假的造物传奇，一下子被具象化。去教堂做礼拜的传统仍然在一些家庭中保留着，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百无聊赖的日子，尤其是我。

于是，一个深秋的清晨，我便很想出去看看当地人都在做什么。从我居住的富维耶山丘出发，顺着起伏的山路迈开步子，远处接踵摩肩的屋顶在眼前一跳一跳。到底是深秋了，隔壁山头似乎罩着层蒙蒙的雾气。雾气渐渐散去，教堂的钟声在早晨的阳光里回声阵阵；身边是老房子，脚下是旧石阶，

行走其间恍若行走在中世纪某个有着诡异传说的小镇。这种小镇总是以灰白的冬景出场，竹篮布裙与礼帽手杖彬彬有礼地相遇致敬。事实上，教堂门口，穿着士兵礼服的军乐队正演奏得认真，晨练的人戴着耳塞心无旁骛地一跑而过。

顺山势向下继续前行，索恩河的点点波光就逐渐开阔起来——

水面宽广而柔顺，三三两两的男女依河堤而坐，或闲聊，或沉思，或手捧书页静静阅读。河边黄的、粉的老式小楼挤挤挨挨连成一片，阳台上簇拥着的小花在悄然绽放。对岸出现一道熙熙攘攘的人流，在寂静的周日里很是乍眼。

跨过桥一瞅，才发现这里原来是一个旧书市。河岸狭窄的过道两侧摆满了大大小小的书摊，书摊上出售各种书籍、杂志、画册，年代与主题不一而足，有的一字摆开，有的集中立在纸盒里，价格大部分在原价的半折左右。行人慢悠悠地浏览，间或驻足挑选，书摊主人坐在一旁看书，阳光下惬意无比。

平时，书就放在书摊老板身后护栏上悬挂的铁箱里，书市的时候打开，十分方便。书摊的老板们工作时间各自忙碌，周日来此相聚摆摊。相比各街区常见的蔬菜瓜果集市，书市显得更加随意自在，没有叫卖，没有讨价还价，与其说是做生意的市场，不如说是打发周日空白时光的绝好去处。

书市自树荫桥一直延续到圣·文森特教堂，而后归于平静。继续逆河而上，就能看到那所大名鼎鼎的美院——里昂国立高等美术学院。

美院呢并不大，三面黄色墙壁的小楼围着红色的沙石院落，入口处的资料架上分门别类地摆放着许多介绍美院概况和相关艺术活动的小册子。本就人数不多的美院在周日更加安静。不过，美院的安静并不意味着它只是一座孤立的“象牙塔”。在美

院以南的街巷中，散布着许多艺术材料商店、画廊和工作室，一直向索恩河以东的半岛内部绵延至里昂美术馆所在的沃土广场；像所有“择群而居”的中心地带一样，以美院和美术馆为两端，这块半岛内的对角线就构成了里昂最有学院派气质的一片艺术区。

里昂美院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美术学院之一，每年的招生名额极为有限。马可说，在他前几届大概只有10个中国人上过艺术专业的大师班，回国之后的境况也不像“外来的和尚会念经”那般容易。后来就再没听说有中国人进校。相对于巴黎这样的“艺术之都”来说，里昂确实不算有口皆碑的美术中心城市，但因为有美院的存在，还是有中国学生在里昂学习艺术（美术），不仅有“纯美术”（造型艺术），还有应用艺术（服装设计、装饰设计等），并以后者居多。

在里昂二大艺术系就读的小杜是我在法国认识的第二个朋友，她就住在离美术馆不远的艺术区。她的住所位于一栋古老的法式小楼内，是一栋单人公寓。房间用一个木质楼梯结构分出一层阁楼，阁楼上休息，下面是工作区和生活区。室内还包括厨房区和浴室。小杜淘来一些二手家具和电器，使破旧的公寓显得完整而舒适。

二

在里昂，还有一处既传统又时髦的艺术区——托尼·卡尼尔都市博物馆。它位于城市东南部的第八区，说是博物馆，其实是一个露天的街区。这里集中了源自里昂的一种艺术传统——墙画，画的内容却是一个关于未来的梦想。

很少有人知道我是个艺术生，没来法国前，我



就知道这个博物馆，这个秋天终于见到了。逛街的过程中，马可充当讲解员，他告诉我这个街区的创建人托尼·卡尼尔是一位建筑师和城市设计师，土生土长的里昂人。作为那个时代的先锋派设计师，他试图建立一个“乌托邦”似的城市空间，并将该地区命名为“合众国”，以实践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

马可说，当时的建筑师建议托尼·卡尼尔将该地区建立一个微型城市。托尼·卡尼尔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于是1920年至1933年之间，建筑师将当地居民组织在一起，修建了包括剧院、市场、居民楼等建筑。不过，遗憾的是，他理想中作为城市未来的“工业化城市”最终没能完成，而如今工业化城市却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兴起，我们终于生活在了托尼·卡尼尔的梦里。

是的，此时我们眼前的博物馆是1988年以后，政府与当地居民通过商议达成的结果——

一方面，是为了保留这片独特的城市风貌，而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纪念这位给后世留下无限城市理想的伟大建筑师。现在的露天博物馆，主要是由他设计的49栋在当时来讲最为先进的居民楼以及楼体山墙上的25幅墙画构成。在我看来，这些展示了他曾经的设计蓝图。得承认，我对于建筑是一窍不通的，我在乎的是这里的画。马可说，这25幅墙画是由来自法国和其他国家的艺术家共同创作，其中12幅是托尼·卡尼尔关于“工业城市”的主要设计草图，4幅是他为里昂设计和主持建造的重大工程，6幅是来自科特迪瓦、埃及、美国、印度、墨西哥和俄罗斯6个国家的艺术家绘制的理想城市，还有2幅艺术家群像和1幅“托尼·卡尼尔之家”复原图。

“世界的”也曾是托尼·卡尼尔的一个梦想，博物馆的Nick博士说：“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希

望这里真的能集合展现来自世界各地艺术家的城市之梦。”我说，那到时候我一定得再来看看。

“合众国”街区已经在1985年至1997年间由政府投资修整。现在的城市博物馆也是许多当代街头艺术活动的场地。相对于常规的博物馆，这种露天的、全民狂欢的形式似乎更符合当代艺术的气氛。

沿着“合众国”大道一路毫无“法式风情”的现代景观，再钻进大道周边的楼群边走边看，一种奇妙的感觉油然而生：30年代的建筑、90年代的装饰、新世纪的文化事件以及未来的城市图景浮光掠影般重叠于我的眼前，恍然之间竟宛若身在某个异次元。白皮肤、黑皮肤、黄皮肤的游客偶尔擦肩而过，“世界的”理想也似乎瞬间实现了一般。

我查了史料，其实这片位于城市东南角的土地，在托尼·卡尼尔进驻前，就已经是低收入区，建筑师设计的居民楼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为这些贫民设计的廉租房。如今虽然有博物馆坐镇，但该区仍然处于城市繁华之外的边缘地段——

游客来了又走，当地居民的生活依然循环往复。夕阳的余晖落在高大的墙画上，仿佛圣母像有光泽的脸庞。

三

赶在入冬前，我去了趟巴黎。那天在塞纳河的兑换桥上，我遇到两个中国人正坐在马扎上为游客画着肖像。其中一位碳条挥舞，画得非常迅速，十来分钟，一幅肖像画就诞生了。被画的老太太笑逐颜开，一个劲儿地竖起大拇指。

画家一边愉快地收好钱，一边招徕着周围的游客。另一位戴着棒球帽的小伙子继续埋头认真画着，并不为旁边的热闹所打扰；做模特的中年男子面带

微笑，耐心等待自己的肖像渐渐变得完整。虽然他速度慢些，效果却不含糊。

休息的当间，“快手”的手机响起，他站起身来走到一边用中文说道：“人不多，你那儿怎么样？”我瞅了瞅摆在马扎上印好的价目表，一幅肖像 160 欧元，学生 130 欧元，本来有意表示支持的念头顿时羞涩了。电话完毕，“快手”转身回来。我说了一句：“你画得比她本人好看，显瘦。”

他愣了一下，随即笑笑说：“他们开心就好，说起来也是巴黎制造，独一无二的纯手工。”

他是天津人，不是职业画家，也没在美院就读，还在学语言。来这画肖像，已有两年多。而“棒球帽”来得晚些，托这位大哥照应，也开始了这份充分利用时间和资源的工作。他没有叫我画画，不知道是体恤同在异乡为异客的穷学生，还是不好意思和同胞做生意。

也是那天，在兑换桥上，我还认识了另一个朋友——老胡。他是一位职业画家，拿过查尔斯·乌蒙基金会美术奖。

他说，有钱人爱巴黎，因为这里有享用不尽的奢华；穷人爱巴黎，因为这里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流浪汉，没有谁比谁更苦难。我说，“不，巴黎的流浪汉是小说中、电影里惹人羡慕的角色呢。”事实如此，居无定所因为发生在巴黎而变得潇洒无比，那是一种可以抛弃一切诱惑的生活，人只以最主体最单纯的形式存在着。

熟知历史的人都知道，曾经的巴黎是以广纳天下人而闻名于世，流亡知识分子、破产商人、犹太人，甚至被四处驱赶的吉卜赛人统统汇集在这里。那个时代的艺术并不仅仅是为了达到艺术自身的成就，它更是艺术家试图冲破旧制度的禁锢，追求创作自由、思想自由的表达。所以，不仅是艺术家，还有

思想家、美食家、教育家等所有愿意为理想而战的人都汇集于此，激发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创作热情。他们没有预想到自己的言行将对后世以及世界其他地方产生多么强烈的影响，只是以自己的方式在探索与创造。然而，有了主张必然有一套言语，那就是令后人纠缠不休、玩味不绝的理论。

老胡说，他们制造了无数在当时看来放浪形骸的举动，如果了解了他们的故事，你也许会感到失望——他们曾经是无业游民、小偷、酒鬼、骗子或者逃兵；他们酗酒、嫖妓、群殴、吸毒、偷盗；他们曾经为了填饱肚子出卖才华，也为了理想献出生命。但我固执地认为，与他们为艺术殿堂所留下的痕迹相比，那只是凡人的必经之路。

傍晚，我到了蒙马特高地，那个被誉为先锋派聚集地的地方。如今，圣心大教堂依然高高耸立于蒙马特的山顶之上。游客们纷纷到此俯瞰巴黎。这座雪白的建筑曾经与山腰间散落的昏暗旅馆、简易酒吧、妓院为伍。伊莎多拉·邓肯与其子弟们正是在这块非法的游击队基地中心赤着脚、轻盈自如地跳着她创造的，后来被称为舞蹈界革命的希腊式舞蹈。昔日那位引发劳特累克灵感的舞女拉·古吕，现在成为具有蒙马特风格的明信片。而她所在的红磨坊，那些穷鬼画家们倘若托生到此一定进不起。这条克里希大街上曾经生意火爆的妓院如今多转为地下，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林立的性用品商店。过去的蒙马特像一个“乌托邦”，被“正统”抛弃的人们在这里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现在的蒙马特同样别具一格，却是被高高悬挂的金字招牌。

蒙马特是为了保持其别具一格的特色才成为一个自治区吗？听上去像是儿戏。老胡说，的确如此。在 20 世纪初，对于独立与自由充满渴望的居民有意地保卫了蒙马特。他们进行了投票选举，成立蒙马

特自治区的提案以绝对优势通过。有人甚至重新穿上在巴黎公社之前保卫巴黎时穿的军装，虽然这样的战斗往往以把酒言欢收场，仿佛堂吉诃德式的狂欢。但可以看出的是，蒙马特一直都有自己的支持者和拥护者，这或许就是蒙马特最独特的地方。

圣心教堂东侧的小丘广场是那个时代的繁华地段，现在是一处著名的绘画广场。用“绘画广场”这样一个模棱两可的称谓，是因为它实在难以形容。叫它画摊？这里的作画者可不单单是为了卖画糊口；叫它艺术市场？这里的画家们可自在多了。

铍州和向滔是我在绘画广场上认识的朋友。铍州告诉我：“一般只摆摊画肖像的人，并不能以这种方式真正在绘画上有什么追求。但小丘广场的这些人是一回事。这里是受政府规划的，以前要申请，有时候需要等一两年的时间。现在不知道具体情况怎样，但仍旧不是可以随便进驻的。”

与别处的街头画家相比，街头艺术家们以在这片小小的露天广场上画画为荣。人们慕名而来，这里的游客也是最密集的。广场被咖啡馆和餐厅环绕，许多人坐在外面的小餐桌旁看他们画画。这里的绘画作品内容丰富，风格多样。有的轻松愉快，比如漫画或波普风格；有的则是经典技法的水彩画或油画。画作尺寸不等，价钱有别。画家们摆出已经画好的作品，同时继续画着架上的画，也并不着急招徕生意。

有位白胡子老先生叼着烟斗，戴着贝雷帽，一脸漫不经心的神情，只顾一点一点上色。他是最“老套”的画家形象。

四

铍州说，其实绘画广场的画摊有逐渐减少的趋

势。想了想，倘若这也是政府管制的结果，那真是令人遗憾。如此重视文化资本并在几个世纪以来因此获益的法国如果都不再“艺术”，那么后世拿什么去延续这种回忆和幻想？

于是，暂且回到它的前世，索性蒙马特的故事还能讲一阵子——

艺术家的生活当然不只是画画，甚至在那个时代，他们穷困潦倒却激情万丈的生活同他们的作品一样被人传颂。而“机灵兔”酒馆就是当时蒙马特帮重要的据点。蒙马特所有的人都来“机灵兔”酒馆。艺术家们都好喝酒，老板经常允许赊账。周日，酒馆的大厅与各个包间全部爆满，顾客中大部分是常客，其中也有少数是对这里的艺术气氛抱有好奇心的人。这里留下了毕加索和费尔南德结伴的身影，更留下了以毕加索为中心并后来成为蒙马特神话中的那群人物。

这间酒馆的前身是阿黛尔大妈开的“刺客酒馆”。阿黛尔大妈是拉·古吕的一位朋友，而这家酒馆是拉·古吕从巴黎公社的诗人、插图画家安德烈·吉勒那里继承下来的。

酒馆的招牌是一只兔子从一口锅上方跳过，象征阿黛尔大妈制作的一道名菜——白葡萄酒烩兔肉。艺术家们借用原主人的家姓吉勒，把该酒馆改名为“吉勒的兔子”，其谐音为“Lapin Agile”，意为“机灵兔”——这就是“机灵兔”酒馆的由来。该酒馆位于柳荫街，后来成为蒙马特一个著名的娱乐场所，同时也是毕加索团体的活动首选地。

铍州说，那时的酒馆内有吧台、包间，室外带平台。室内昏暗，但贝尔特——一个勤快麻利的勃艮第人，每天将它打扫擦洗得一尘不染。用固定在屋顶上的铁丝挂着的煤油灯，在红色灯罩下泛着吝啬的黄光。墙壁上挂着一个硕大的白色基督雕像和

郁特里罗、布尔波特、苏珊·瓦拉东的画作，以及毕加索 1905 年创作的一幅浑身披戴花环的自画像《在“机灵兔”酒馆》。

现在的“机灵兔”依然保留着以前的砖石结构，位于郁郁葱葱的花草树木之中，但已经显得十分局促，若非留心，可能一步就错过了，很难想象它曾经容纳过如此多的人和事。酒馆旁边紧挨着被保留下来的一块葡萄园，它和“机灵兔”一起，成为旧时蒙马特郊外田园的见证。

1904 年，毕加索第四次从西班牙回到法国后，他的朋友陶瓷雕塑师帕克·杜里奥为他们腾出了他在蒙马特山上的作坊——那是一座稀奇古怪的房子，原来是一个钢琴生产车间。他们用木板把它隔成几间后，这里便成了艺术家们的官邸。由于房间建在半山腰，于是入口开在最上层。为了进入各自的房间，人们必须在进大门后往下走，首先进入夏天火热，冬天冰冻的昏暗过道。每个房间由朝蒙马特山顶开的大窗户采光。这座房子里有几个卫生间，唯一的水龙头在二层。下层的天花板就是上层的地板。房子的隔音效果十分糟糕，相邻房间的任何响动相互都听得见：歌唱声、叫喊声、脚步声、床铺的吱嘎声，以及时不时的呻吟声……木质地板丝毫不妨碍邻居之间相互了解别人家里发生的一切事情，甚至他们的任何动作。所有的门几乎都关不上。但是，毕加索为他们终于有了落脚的地方而兴奋不已。他以贪婪的神情欣赏着这座与众不同的全木建筑。他给房子起了个名字，叫“猎人馆”。这座简陋的房子酷似塞纳河上洗衣妇们搓洗衣服的平底船，于是马克思·雅各布有了一个新主意：给这座房子起名为“洗衣船”。

在“洗衣船”，毕加索住在最上层，即这座奇特建筑的门厅层。模仿咖啡馆和小酒馆的招牌，他

在入口处的门板上用粉笔写上：“诗人会晤处”。

来访者推开这块牌子，发现一个小小的入口。入口正对着一个地面发霉的小房间。进入房间，里面有一张床和一个生锈的铁火炉。室内充满了浓重的黑烟丝香烟、煤油和麻油混合的气味。在黑暗中，能够辨认出一个代替洗手盆的脸盆，盆里随便丢着一条毛巾和一小块黑乎乎的香皂。屋子里还有一个草席椅子、几个三脚架和一些规则不同的画布；地面上到处乱扔的无数颜料管、画笔以及盛满稀释剂的器皿。一只白色老鼠在一个带抽屉的桌子后探头探脑，它对屋子里的人毫无惧色。一盏煤油灯是这个房间的唯一光源。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浴盆，里面放着数十本书。这里，有一只黑色木箱子被当作座椅使用；那里，一个桶里盛满废水等着人去倒。整个屋子乱七八糟……

这栋破旧的房屋已毁于 1970 年的火灾，只剩临街的门面。1978 年全部重建，被改造为工作室，现在仍然居住着数位艺术家。一层的橱窗展示着关于这栋房屋的资料和照片。

蒙巴纳斯成为继蒙马特后的第二个自由的制高点。起初，那里的文学家比艺术家多，到处能见到写诗的人。法国国家高等美术学院就在相距不远的拉丁区。其实，早有画家居住在蒙巴纳斯，蒙马特的画家们也有蒙巴纳斯的友人，只是在他们为避战乱、大规模地转向蒙巴纳斯以前，塞纳河两岸的画家们很少交流。画家们与文学家们让这里热闹了起来，他们互为灵感的创作或合作继续充实着世界艺术的宝库。

蒙巴纳斯也有自己的“洗衣船”——“蜂箱”，也有自己的“机灵兔”——瓦万大街。相对于像毕加索这样极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很富有的画家来说，蒙巴纳斯的画家们还过着朝不保夕、

随时会被房东赶出公寓的日子。再加上即将发生的战争所带来的饥饿与萧条，艺术家的生活远不如蒙马特那般“世外桃源”。如果说，蒙马特时期的立体主义已经足够令当时的视觉标准咋舌，那么蒙巴纳斯时期就要挑战想象力的极限了——

在1912年的独立派画展上，逃兵马塞尔·杜尚的立体派朋友们劝他摘下那幅《下楼梯的裸女》，以免遭受过多的谴责。第二年，他坚持要在立体派的画展上展出这幅作品，同时成为纽约军械库展览（现代艺术国际博览会）中的明星。然后，他就跨过大西洋去了美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们如同爆炸后的铅沙子弹，纷纷离开巴黎，星散于法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蒙巴纳斯经历了饥寒交迫的时期、组织秘密集会的时期，也重新组织过和平展览。停战协议签署之后，人们的生活逐渐恢复正常。昨天已经成为过去，蒙马特播下的种子，蒙巴纳斯即将收获其成果：巴黎出现了超现实主义思潮。同许多人一样，诗人和画家们也抛弃了四轮马车，换乘上汽车，径直而快速地奔向未来。

毕加索是西班牙人，莫迪里阿尼是意大利犹太人，夏加尔是俄罗斯犹太人，梵高是荷兰人。当然，还有许多法国人。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印象，巴黎会如此风姿绰约，令人念念不忘吗？

在艺术史中，我们没有忽视梵·高对日本版画的喜爱，非洲雕塑对毕加索的震撼，以及太平洋风光对马蒂斯的诱惑；也没有忽略他们跋山涉水的起点，但只因他们属于那个时代的巴黎，他们就不是艺术史上的“他者”，而巴黎也就成为那个独一无二的“整体”。说巴黎是世界艺术的中心，不如说，是世界艺术成就了巴黎。百年之后，仍然有无数来自世界各地对艺术怀有梦想和雄心的人到此苦苦追

寻巴黎的美。殊不知，那美原来是个万花筒，美的碎片里本就有着你、我、他。

毕加索来巴黎的目的是参加1900年的世界博览会。他的《最后时刻》被选中，代表西班牙来巴黎参展。他对法国毫无了解，并没有打算久居。他离开故乡，是觉得故乡太穷，视野太小，家庭气氛十分压抑，希望外出透透气。如果有一天他决定长期地越过比利牛斯山，离开西班牙的话，那也是为了前往英国，去追随英国的拉斐尔前派画家。但是在此次博览会期间，他遇见了许多画家，后来成为挚友，于是他决定留下来。他的朋友都住在蒙马特，他也来到蒙马特，并且在“前辈”们的帮助下拥有了自己的画室和卧室。五年之后，他成为那一帮人的领袖。

许多背井离乡的人来到法国时，只知道一个法语单词——Paris。选择这个城市，只是因为早来巴黎的人向他们传递了有关这里的信息。其实，即便是艺术家移民，也依然具有移民的普遍因素——聚集和互惠。因此，这些外乡画家们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时代和地域的标识。早期居住在蒙马特的移民中，来自邻国的西班牙人是主要的一支；蒙巴纳斯由于是法国北部布列塔尼地区进出巴黎的交通要塞而聚集了一批布列塔尼画家；蒙巴纳斯“蜂箱”的大多数房客来自中欧和东欧，他们都是大战前几年来到此地的移民。

如今，生活在巴黎的中国艺术家们也有着各种各样的选择动因。向滔在巴黎有亲戚；他的女朋友阿雪便跟随他一起到此；小杜起先因为被梵·高感动而去了南部普罗旺斯的阿尔勒，后来因为巴黎有更广阔的发展条件而来到巴黎；钊州和老胡则确实只是因为这些关于巴黎的传奇，首站就来到巴黎并一直居住在此……我无法决然地断定哪一个原因更

重要，但他们曾经或者最终选择留在这里，却无一不是与巴黎的艺术神话有关。同样，没有选择巴黎或者离开巴黎的人，也并不是不为神话所动。他们或许是选择用另一种方式与神话靠近，或许是因为心愿已了。马可在巴黎学习两年之后去了雷恩，他说，那里的学校可以让他有一间自己的画室。

除了向滔住在巴士底，老胡住在蒙巴纳斯，我在巴黎的画家朋友们几乎都没有住在市里，而是集中在郊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市区人口稠密，房租太过昂贵。像所有的一线大型城市一样，巴黎的市区主要用于商业、旅游和城市景观建设等，缔

造城市的人反而没有城内的安身之所。做版画的向滔有幸找到了一家工作室，制版、印刷都可以在那里进行，因此对租房的要求也就不是很高。老胡以前也和一群朋友住在郊区，后来作品卖得越来越好，参与的交流活动也越来越多，收入相对稳定，就索性搬到了蒙巴纳斯。更多人选择住在郊外，以相对低的房租获得相对大的房屋空间，平时安静创作，有活动的时候再来市区。巴黎市区及周边交通便捷，而且对于中国人的地理概念来说，一到两个小时的车程在大型城市里司空见惯。

作者：夏梓言，男，湖北蕲春人，文学博士，知名青年作家。获教育部人文社科奖、吴伯箫散文奖、四川散文奖、蔡文姬文学奖等多个奖项。曾访学于法国巴黎第七大学，现任武汉工程大学讲师，入选“青年拔尖人才”计划。

